

容庚著

商周彝器通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容 庚 著

商周彝器通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彝器通考/容庚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08 - 08008 - 9

I. 商... II. 容... III. 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商周时代 IV. 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030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美术编辑 杨德鸿

监 制 任锡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商周彝器通考

容 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62 插页 6 字数 400,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008 - 9/K · 1467

定价 180.00 元

二十世紀青銅器學的奠基之作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

曾憲通

容庚先生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最近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印行，這是我國青銅器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出版社要我提供有關這部書的背景材料，好讓讀者瞭解這部名著的方方面面和來龍去脈。由於容庚先生是我的恩師，我同商周彝器通考也有過一段難忘的情緣，這件工作是義不容辭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然而，在這以前的中國青銅器研究領域內，已相繼出現了好幾部具有重大影響的標誌性著作，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版的金文編、三十年代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四十年代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和五十年代出版的殷周青銅器通論。正是這幾部豐碑式的著作開啓了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的新時代。值得指出的是，這幾部著作都同一個名字聯繫在一起，他就是學術界景仰的容庚先生。

一、首部專集金文字形的金文編

容庚先生原名肇庚，字希伯，又作希白，號頌齋。廣東東莞人。先生出身於晚清書香世家，其高祖、曾祖分別是道光年間的貢生、舉人，祖父鶴齡系同治恩科進士，外祖父鄧蓉鏡官至翰林，父親作恭為光緒丁酉科拔貢。世代雖習科舉之業，然不喜為官，皆以傳習文史為己任。先生自幼飽讀經書，聰穎過人；但先人早逝，直接給他以親炙的是四舅鄧爾雅和從叔容祖椿。鄧爾雅是廣東有名的書法篆刻家，容祖椿工於繪畫。先生從小就受到長輩學術與藝術的熏陶，這對他一生的治學影響極大。1913年，當先生還在中學唸書的時候，就已經對金石文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研讀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和桂馥的繆篆分韻時，即萌發補輯之意。1917年中學畢業，不復昇學，與弟妹策劃共同集篆籀之見存者為商周秦漢文字叢書，金文編稿本便是其中之一種。

1922年，先生與三弟肇祖北上求學，路過天津，挾金文編稿本謁見了著名的考古學家羅振玉，深得羅的賞識。羅謂金文編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囑“務竟其

成”。並把容庚先生推薦給北京大學的馬衡教授，容先生遂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爲研究生。1925年金文編書成，羅振玉、王國維、馬衡、沈兼士、鄧爾雅諸前輩爲之校訂並序。初版由羅氏貽安堂印行。王國維序云：“癸亥冬日，東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編相示，其書祖述中丞而補正中丞書處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中丞”即吳大澂，吳氏編纂古文字書的方法超越前人，其說文古籀補收字盡據拓本，分別部居悉依說文，疑似不可識者則別爲附錄待問，此三者成爲後來丁佛言說文古籀補、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編纂古文字書的不二法門。吳書的這些優點，金文編都充分地加以吸收。但吳書以說文爲科律，一準許氏舊例，以出土古文字等同於古籀以補說文，實則把古文字作爲說文的附庸而已。在這一點上，容庚先生作了很大的改進，金文編以收金文爲主，僅僅把說文部首作爲編排金文字形的序列；凡金文字形與說文小篆有異者，則以金文糾正小篆之訛誤，說文所無之字則附於同部之末。其次，在收錄字形方面，吳書除收錄金文外，還雜有古陶文、古璽文和古幣文等字體，排列次序難以體現時代的先後；且字體劃一，只能按拓本對臨，字形難以確保精準。金文編則專收金文，字形大小完全按照拓本或照片按原樣臨摹，故能體現異體字之間的細微差別，同一字的字形則按照時代的早晚排列，從中可以窺見金文字形發展的軌跡。第三，吳書對古器中的象形字，如犧形、兕形、鷄形、立戈形、立旂形、子執刀形、子荷貝形之類，概不採入。金文編不但採錄大量的圖形文字，且區別對待，其中少數可識者入正編，其不可識者爲附錄上，形聲之不可識者則爲附錄下。此外有關金文字形的孳乳、通假和訓釋，也較吳書翔實精當；至於所採集之金文資料更是吳書所無法比擬的。總之，金文編是繼說文古籀補之後在材料、體例和編纂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專收金文的大型字書，由於它比吳書更加詳備和矜審，深得學術界的推崇，至今仍是古文字學者案頭必備之書。

二、容庚與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

容庚先生大力協助郭沫若完成兩周金文辭大系，曾經是學術界廣爲流傳的佳話。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爲了逃避反動派的迫害，東渡日本，從事一種新的“革命的努力”（周恩來語），即以馬列主義指導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當他發現自己據以研究的傳世典籍的可靠性值得懷疑之後，便把注意力轉移到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上來，認爲舍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無由洞悉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他在極度險惡的環境中，把當時“無處發泄的精力”都傾注到甲骨文和古金文的探討上面。但他只身在外，且僻居鄉間，又無可與商討之人，倍感孤寂。當他從王國維爲商承祚先生的殷墟文字

類編·序中得知容庚先生的名字，又在燕京學報上瞭解到容先生的通訊地址之後，便給素不相識的容庚先生寫了第一封信，信中說：“曩讀王靜安先生殷墟文字編·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復披覽大作金文編，用力之勤，究學之審，成果之卓犖，實深欽佩。”信末署名“未知友郭沫若”，時間在1929年8月27日。信中還就金文編中兩個學術問題向容先生請教。容先生出於對這位身在異域而致力於祖國古文字研究的“未知友”的敬意，隨即回了他一封信，並把他急需的紳簋和秦公簋的銘文拓本寄送。隨後又把當時珍如拱璧的殷虛書契前編遠道見假，而且一借就是一整年，令郭氏大為感動。此後便不斷書信來往，商討學術，互通聲氣，彼此結成親密的文字之交。從1929年至1935年，郭沫若在日本致容庚先生的論學手札共有五十六通，就是這兩位古文字學大師學術情誼的見證。

郭沫若嘗說過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他在日本一共度過二十個年頭，前十年從事新文學的創作，後十年從事新史學的研究。新史學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鼎堂古文字學十書”，其中尤以兩周金文辭大系在金文學研究上的建樹最為突出。此書作於1931年年初，最初擬名為兩周金文辭通纂，郭氏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屢見有關此書進展情況的報告，如云：“今撰兩周金文辭通纂一書，已略有眉目。”（1931年2月16日）再云：“金文辭通纂大體已就，分上下二編：上編錄西周文，以列王為順；下編錄東周文，以列國為順。上編仿尚書，在求歷史系統；下編仿周詩，在求文化範圍。辭加標點，字加解釋，末附以雜纂及殷文——全書之大體如是。上編頗難，亦頗有創獲處，惟所見有限，待兄援手之處甚多。”（1931年3月20日）又云：“弟近忙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原注：通纂改名）之謄錄，論莊子一文尚無暇整理。大系近已錄成，本擬先寄兄一閱，惟出版處催稿甚急，只得待出書後再請教。”（1931年9月9日）又云：“拙著通纂改名大系，已付印，大約於年內可望出版，書出後自當呈政。”（1931年9月27日）從以上信札看來，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當成書於1931年1月至9月之間。1932年1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以十六開本印行，封面與扉頁均有作者手書的書名，副題為“周代金文辭之歷史系統與地方分類”。前有“序”文與“題解”，後附“索引”。全書總276頁。插圖十三種，計十七圖，注云：“此書插圖多得自燕京大學教授容庚先生之惠借。”可見容庚先生對兩周金文辭大系初版的出版，實有促成的作用。其實，當此書脫稿時，郭氏本擬通過容庚先生在國內出版。1931年4月9日嘗致函容先生，表示為瞭解出獄病友的藥石費用，願將近著兩周金文辭大系用鼎堂筆名由前中央研究院出版，並請為預支版

稅日幣四五百元。容先生古道熱腸，接信後立即應郭氏之請預支版稅數百元，以解燃眉之急。後出版事被擱置，大系遂轉由東京文求堂印行。大系出版三年之後，郭氏又先後編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兩書，圖錄是相關器物的圖象、花紋和銘拓；考釋則是對大系初版的增訂，分別於1935年3月和8月由日本文求堂據手迹影印出版。至此，大系初版遂告作廢。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沫若毅然回國救亡。1956年郭沫若將以上二書請容庚先生代為校訂，容先生提了不少意見，凡採納者郭沫若都在書內加以說明，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函八冊，於195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可見容庚先生對於大系自始至終都有促成的作用。郭氏的兩周金文辭大系首先發明“標準器系聯法”，即先從銘文入手，以若干有年代可考的銅器為標準器，再串聯本身無年代可考的銅器，然後對各期銅器的銘文和形制、花紋等進行綜合考察，為青銅器的斷代研究奠定了基礎；而西周銅器銘文以列王為序，東周銅器銘文以列國為序，更為青銅器銘文的分期和分域研究開了先例，對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

三、商周彝器通考的出版與重訂

（一）商周彝器通考的前期工作

容庚先生在金文編出版後的第二年，即1926年3月9日“接聘為燕京大學襄教授”，12月6日“內務部函聘為古物陳列所古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俱見容庚自訂年譜）。在古物鑒定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古銅器的名稱問題。先生鑒於自宋以來對銅器的定名相當混亂，為治斯學者，遂於1927年3月作殷周禮樂器考略一文，在燕京學報第一期發表。先生在敘述作此文的動機時說：“余觀諸家所圖之尊，有似觚者，有似觶者，有似壺者，有似壺者，異器而同名。所圖之鼎，有方者，有圓者，有有蓋者，有附耳者，同名而异狀。而自載之名，同一鼎也，有名鼎者，有名鼐者，有名鬻者，有名釶者，有名湏者，有名石沱者，同器而异名。竊欲理而董之，厘定其名稱，以為治斯學者之助。”此文分殷周禮器與樂器兩大類而逐一加以考定。共分三十二類。禮器計有：鼎、鬲、甗、簋、簠、盨、盧、孟、盒、豆、盤、匜、鑑、壺、壺、簠、盃、卣、爵、觚、觶、角、罍、觥、勺、匕、禁、尊、彝，共二十九種。樂器有鐘、句鑃、鐸共三種。每類器物下都詳細記述其形制、名稱以及銘文所在的部位，最後附以圖片。其中簠類補充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及黃紹基翠墨園語·說殷之說，確定銅器銘文中的“殷”就是“簠”，此後即成為定論。要之，此文是先生系統研究青銅器的第一篇重要著作，其分類法為其後撰寫商周彝器通

考打下了基礎。

從1927年3月作殷周禮樂器考略到1933年5月擬編商周彝器通考，前後六年，可看作是編纂商周彝器通考的醞釀期，先生在此期間做了如下幾項工作：

1. 編集金石書錄。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和燕京大學教書時期，就已廣泛蒐集金石書籍資料，每月以薪酬之半購書，所見所藏金石書籍約千種，摘錄序跋、凡例及各家評語，得百餘萬言，意欲每書為作提要，略述其體例版本得失。後因教務日忙，才將編撰金石提要的工作交給其妹容媛。容媛先輯目錄，先生親自為之校訂、撰序，成金石書錄目一書，於1930年出版。後又撰宋代金石書考目及宋代金石佚書目二種，發表於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

2. 改編金文著錄表。先生初治金文即得益於王國維的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二書。然宋代金文著錄表於書名下不注卷頁，不便查檢，其他也有不盡善處，故先生略變其原書體例，重新加以改編：①原書依書名為先後，改為依字數為先後；②訂正宋人器名之誤，如改敦、彝之為簠，簠之為盨，匱之為觥等；③原書各器不列朝代及字數，也不注卷頁，悉為補入。④原書於金文之存、佚、偽不分，改以存者為主，佚者及偽者附錄於後。全書分器物為二十三類，五百二十一器，附錄一百二十七器，共六百四十八器。書中引宋人及近人著作共十八種，查閱稱便。

3. 厘清西清銅器的存佚和真偽。1925年先生參加故宮博物院彝器陳列工作，發現內府舊藏率多贗品。1927年任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每月參與鑒定會議，有機會接觸原器原物，手自摩挲，辨偽經驗日進。因作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一文，取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和西清續鑑乙編四書中有文字之器一千二百九十，除鏡鑑一百一十四，得一千一百七十六器，分“真、疑、偽”三類，表列出之。其中“四鑑”所定之時代及器名有誤者，皆為厘正。有內府藏器或摹本留出人間，其見於各家著錄而銘辭相同可知為同器者，亦備註之。先生憑其金文編的文字功底和鑒定委員親自接觸數千銅器的閱歷，對於四鑑銅器的“真偽頗有了然於心”。其鑒定文字真偽之法約有六端：①凡仿宋代著錄之器者皆偽；②改易宋代著錄之器銘者亦偽；③移宋代著錄之器銘於他器者偽；④文語不合於古器銘辭體例者偽；⑤器形與古不類者偽；⑥僅作普通銘辭者，亦多偽。諸表先列四鑑器數及有銘器數，然後以字數多寡及“真、疑、偽”為先後，分別就鼎、鬲、甗、簠、簠、盨、孟、豆、鋪、盤、匜、監、壺、壺、簠、盃、鈎、卣、爵、觚、觶、角、罍、觥、瓶、尊、彝、鐘、鐸、洗、雜器等，逐器加以甄審，計真者六百五十七器，疑者一百九十

器，偽者三百二十九器，可見乾隆以前銅器作偽的一斑。這是西清藏器據著錄而作的一次大清理，對於故宮所藏彝器的辨偽是大有裨益的。

4. 編撰吉金圖錄和考釋。圖錄是研究古銅器和金文的原始材料，先生一向以蒐集和編纂原始材料為第一要務。當先生任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期間，因時局多變，鑒定工作常被迫停頓，全賴先生獨力堅持，終於編成並出版了寶蘊樓彝器圖錄和武英殿彝器圖錄各二冊，後又將頤和園藏器編為西清彝器拾遺一冊，世人始得一睹清宮內府藏器的真面目。而武英殿彝器圖錄更以摹拓花紋與銘文並重，開著錄銅器花紋之先河。與此同時，先生還將自己收藏的彝器編成頌齋吉金圖錄一冊和續錄二冊，從劉體智的善齋吉金錄中選取照片一百七十五器，附以銘文，並加考釋，編為善齋彝器圖錄三冊。此外還從七種日文書籍中選取流失海外的商周彝器一百五十八件，編為海外吉金圖錄三冊。先生編制“圖錄”一般皆附“考釋”，除徵引各家之說外，還詳細陳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先生總是很自謙，常說自己編制圖錄意在呈材，他在善齋彝器圖錄的“自序”中說：“余之著書也，以器物為主，精印流佈，讀者將自得焉，則余之考釋為筌蹄也。”

5. 評介宋人研究古銅器著作。金石之學肇興於宋，先生作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介紹宋人有關古銅器的著作計二十種，但存者少而佚者多。該文先列書之存者八種，計有：呂大臨 考古圖、考古圖釋文，趙九成 續考古圖，徽宗敕編博古圖錄，薛尚功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 嘯堂集古錄，王厚之 鐘鼎款識，張掄 紹興內府古器評。每書詳細記載各種版本、作者、體例以及書之得失等。後附書之佚者十二種，計有僧湛詮 周秦古器銘碑，楊元明 皇祐三館古器圖，劉敞 先秦古器圖，胡俛 古器圖，李公麟 考古圖，黃伯思 博古圖說，趙明誠 古器物銘碑，晏溥 晏氏鼎彝譜、紹興 稽古錄，王楚 鐘鼎篆韻，薛尚功 廣鐘鼎篆韻。以上書雖不存，但先生據他書所載詳加考辨，對治斯學者頗有裨益。此外還有僅存書目，無可稽考者十二種；雖非專著，頗有論述，足供參證者二種。最後論述如何整理宋代著錄的銅器，提出四項：甲、宋代古器著錄表，乙、宋代金文校釋，丙、宋代金文編，丁、宋代考古叢談。除首項先生在王國維 宋代金文著錄表的基礎上加以改編之外，其餘三項，先生也提出具體意見，以待來者。

(二) 商周彝器通考的主要內容

容庚先生經過六年的前期準備工作，編撰商周彝器通考可謂水到渠成。據頌齋自訂年譜，關於商周彝器通考的成書過程有如下的記載：

- 1933 年 5 月擬編商周彝器通考；
- 1938 年 6 月起編纂商周彝器通考；
- 1940 年 3 月商周彝器通考初稿畢，修正後於 11 月付印；
- 1941 年 3 月商周彝器通考印成。

綜觀銅器研究的歷史，自宋以後，大多着眼於銅器個體的研究，所著書籍或只錄圖銘，或僅釋文字，或間加考釋，或闡發一端，均無以觀其會通，缺乏一部能够統觀全局，匯通各種資料，如實反映我國青銅時代偉大創造的綜合性著作。先生前雖有殷周禮樂器考略一文發凡起例，但嫌過於簡略，故自 1933 年起，以八年之力，昕夕耕耘，寢饋其中。他據所見彝器結合文獻記載分別爲銅器命名、定名和正名的基礎上，將五十七種古銅器分爲食器、酒器、水器（含雜器）和樂器四大類，逐一加以介紹，並作全面的審視和考索，終於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這一巨著。此書首次突破宋清以來金石學的模式，從器物的形制、花紋和銘文的流變作綜合的研究，把辨偽、斷代、釋文、考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全書分上下二冊，上冊文字部分又分爲上下兩編。上編“通論”是關於青銅器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包括下列十五章：

- 一、起原——說明彝器製作的緣起；
- 二、發見——敘述自漢以來各重要的發現，分別說明發掘的時間、地點及出土的器物數量等；
- 三、類別——分食器、酒器、水器及雜器、樂器四類；
- 四、時代——先叙各家關於考訂時代的方法，後依郭沫若的方法分爲四期，即商時期、西周前期、西周後期、春秋戰國期；
- 五、銘文——闡明商周至春秋戰國各個時代銘文的演變；
- 六、花紋——取所見花紋，於其特徵加以詮釋，每種花紋均附有拓本附圖，共二二七個；
- 七、鑄法——參證古籍，說明殷代的範鑄；
- 八、價值——記述各代關於古器的價值；
- 九、去鏽——說明各種去鏽的方法；
- 十、拓墨——說明拓墨的技術；
- 十一、仿造——記述宋明兩代仿造之多；
- 十二、辨偽——把作偽之器分爲三期，辨別偽器甚詳盡；

十三、銷毀——列舉古器遭受六次大量的燒毀；

十四、收藏——記載自宋至今各藏家對於青銅器的收藏；

十五、著錄——評介自宋以來關於青銅器重要書籍五十七部。

下編“各論”分類繫器，即分為“食器”、“酒器”、“水器與雜器”以及“樂器”四章，每章先定器用之宜，製作之由，進而結合銘文所在的位置及器形之大小，對共名、別名等器物名稱作詳細的分析和系統的闡發。文內插圖二百多幅。下冊“圖錄”部分附圖一千零九幅，除一幅為拓本外，全是原器的照片，不僅有器形，還有器上的花紋，其中有一些器今已不知去向，可見通考所附的器形圖是非常珍貴的。全書搜羅宏富，抉擇有方，考證矜審，圖文並茂，洋洋乎三十多萬言。于省吾先生為此書作序指出，本書“分章輯述，究極原委，甄錄載籍，參以己見，探邃蹟，理紛拏，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學之鈐鍵，洵為空前之勛作、稽古之寶典矣”。這一寶典是容庚先生充分吸收宋清兩代金石學的成果並益以近代考古學的成就而集大成者，是對中國青銅器作系統理論闡發和科學分類的劃時代著作，它的出版，標誌着中國青銅器研究由舊式金石學邁入現代青銅器學的里程碑。

（三）商周彝器通考的重訂與流產

新中國建立後，隨着基本建設的開展，考古事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全國各地陸續發現了不少青銅器資料。1954年6月，容庚先生致函中國科學院 郭沫若院長，建議增訂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二書。第三版金文編蒙郭院長介紹由考古出版社出版；商周彝器通考由於資料不足，便被擱置下來。1959年6月，容庚先生在學校的支持下，帶助手和四位在學的副博士研究生北上考古實習，同時也為改編商周彝器通考收集資料，筆者有幸作為容先生的助手隨行。容先生一行先後到杭州、上海、蘇州、南京、泰安、大汶口、濟南、北京、鄭州、洛陽、西安、武漢、長沙等地參觀考察，在各大博物館看到大批傳世和出土文物，尤其在上海博物館和北京故宮鈔錄了大量的青銅器卡片。在京期間的7月16日，郭沫若院長在百忙中還撥冗接見容先生和隨行人員，當我們向他請教關於重訂商周彝器通考的意見時，他非常謙遜地說，自己從抗戰以後就不搞青銅器研究了，但他強調今天研究青銅器要充分利用考古的新材料和新成果，接着他介紹近年在安陽小屯新發現的一座殷墓，他邊說邊寫，把整個墓葬的形制、骸骨以及隨葬品的種類和位置都繪畫出來，並分析其意義。其超人的記憶力令人驚嘆！最後，他要求我們研究古銅器不要局限於器物本身，而要聯繫整個歷史，不然就會陷入繁瑣的考證。這次會見

雖然時隔數十年，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這次收集到的資料大多數是文字記錄的卡片，缺乏照片和拓本，重訂通考的工作實際上難以進行。

1962年春，廣東省政協開會，有一天晚上政協招待委員們觀賞戲曲，容庚先生坐在周揚旁邊。休息時候，周揚介紹容先生給康生認識。兩人只是彼此知名而從未謀面。康生問容先生近來搞什麼研究工作。容先生說擬重訂商周彝器通考，1959年曾與助手們北上蒐集資料，但許多博物館不給予照片和拓本，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難。他倆還寒暄了幾句。過了幾天，康生驅車直到容庚先生家中探訪。學校領導聞訊趕來作陪。容先生提出要再次北上蒐集古銅器資料，並要求把張維持先生從歷史系調來當他的助手，學校領導立即表示大力支持。康生說，重訂商周彝器通考的工作可列入文化部的項目，這次以文化部的名義到各地作學術考察。如遇到困難，可請當地黨委宣傳部解決。沒過多久，十幾封由文化部蓋章的出差“證明”和同樣封數由康生簽署的“介紹信”便寄到學校來。康生簽署的時間是1962年3月12日。4月6日，羊城晚報以“容庚教授北上考古——為改編商周彝器通考做準備，為期五個月”的顯著標題發佈消息說：“我國著名的金文和青銅器專家、中山大學 容庚教授於本月一日率領科學小組北上，到我國各地作為期五個月的學術考察，為改編商周彝器通考這一巨著做好準備。”這次科學考察小組由容庚先生率助手張維持、馬國權和曾憲通一行四人，先後到過十九個城市的博物館、文物隊和考古遺址，看到許多新出土的各色文物，其中不少是經過科學發掘的青銅器，有比較明確的年代、地望和國別，是十分珍貴的學術資料。通過調查和探訪，共收集和記錄到三千多件古銅器的資料和部分照片、拓本等，有關單位表示將會陸續提供製版用的照片和銘拓。在考察過程中，容先生對着各種實物詳為說解，諄諄善誘，還不時回答各種問題，使同行者深受教益。此次到處都安排較高規格的接待，容先生為了節約國家開支，都謝絕了。如上海文化局安排住錦江飯店，先生不住主樓而和助手同住四人的大房間；在北京，文化部安排住新僑飯店，而先生却堅持要住故宮西角樓招待所。招待所的設備很簡陋，沒有服務員，床鋪被褥是租來的。我們在北京逗留將近一個月，為國家節約了一大筆開支。這次出行全程乘火車，凡不超過24小時的，容先生同大家一起坐硬席而不坐軟席。這次行程數萬里，歷時三個多月，只用了旅差費三千多元。由於容庚先生搞不清共產黨的“黨委宣傳部”和國民黨的“黨部”有什麼區別，每當持康生的介紹信到省委宣傳部時，總是說“我們先到黨部來報到”，一度出現過尷尬的場面，後來他就再也不用康生的介紹信了。

返校後，科研小組即着手重訂商周彝器通考的工作。大家根據收集到的資料，在容庚先生的主持下，擬訂了修改計劃和章節提綱，對原書在內容和結構上作了較大的調整和增補，計劃將文字部分增加到四五十萬字，圖版不少於二千幅，並作了具體分工。爲了聽取學術界的意見，部分初稿先行在刊物上發表，如修訂稿第一章中國青銅器的起源和發展發表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評中國青銅器外文著述發表於中山大學學報 1965年第3期。其他部分由於後續資料不濟，一時還未能定稿，尚在繼續撰寫和討論之中。1965年冬，容庚先生到北京開會，會上批判之聲四起，一股濃濃的火藥味，讓他意識到一場大革文化之命的災難即將降臨。會後他決意到中華書局去，把正在排印的頌齋述林的書稿取回來“修改”，以免授人以柄。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一向以質直無城府著稱，敢於仗義執言、針砭時弊的容庚先生首當其衝，他被“莫須有”地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家裏的圖書資料全被封存起來，打入“牛欄”，常挨批鬥，失去了人身自由，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日子。“文革”後期，容庚先生將一份六百多字的容庚自傳交給一位香港朋友，自傳最後有一段這樣的結語：“一九四六年南歸，以後整理國故，以傳古人，甚少作畫，如此一生，庶幾其不負矣。光緒二十（一八九四）年八月初六日生，一九七一年卒，年七十”。著有商周彝器通考等書十餘種。”按容庚先生於1983年3月6日逝世，享年九十歲。從這段結語中留下的兩處空格可以看出，先生當年的心境已覺得自己天年無多，連八十歲都不敢想，更不用說九十歲了。而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只提到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作爲代表，可見此書在先生心目中的份量。打倒“四人幫”以後，年邁的容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增補金文編和修改殷周青銅器通論方面，就沒有再提及重訂商周彝器通考的事了。嗚呼！先生本來行將實現的宏圖大略終因不可逆料的動亂而宣告流產，實在是中國學術史上難以彌補的損失。

四、殷周青銅器通論與“手批遺稿”

1953年夏，中山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多位教師要求容庚先生爲他們開設青銅器知識講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講師張維持先生是這個講座的發起人。張先生原來學的是社會學，對陶器頗有研究，精通英文和日文，曾擔任過聯合國兒童救濟基金會專員的翻譯和澳門日報的主筆，翻譯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著有石灣陶器等書，容先生戲稱他是個“淘氣雜家”。對於大家熱切的請求，容庚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每逢星期五晚上在他家中講授有關商周青銅器的專題，還有茶水招待。容先生結合自己

收藏商周青銅器的實物，詳細解說青銅器的名稱、形制、花紋、銘文以及如何判斷銅器的年代和鑒別真偽的方法等，講了整整一個學期。聽講者感到收獲很大，希望先生能編一本有關青銅器的通俗讀物供大家學習。隨後，容先生建議張維持把聽課的筆記整理整理，吸收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兩人合編一本十萬字左右的青銅器讀本，以應社會的需求。張先生遂按照商周彝器通考的體系，選擇其重要內容，參考了近十多年來有關研究青銅器的論著，重新編寫。在編寫過程中，容先生十分強調一定要利用第一手材料，對書稿中引用的第二手材料都一一重新核對。結果在資料和字數上都比原定計劃增加了一倍，凡十九萬字，圖版三百幅。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作為考古專刊之一，於195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印數只900冊。此書共分十章：

一、中國青銅器的製作及其時代。

二、青銅器的埋藏及其發現。

三、青銅器的年代考證和分期。

四、青銅器的類別和用途。

五、青銅器類別說明。

六、彝器的考釋及其對歷史研究的作用。

七、青銅器花紋分析。

八、有關青銅器技術上的問題。

九、青銅器的仿造和偽造。

十、青銅器著錄書的評介。

此書綜合論述青銅器在歷史研究上的價值，同時也探討了青銅器在製作和整理上的技術問題，最後對歷代著錄的青銅器著作分“圖像”、“款識”和“通考”三大類逐一評介。書中插圖104幅，書後圖版304件。此書未能充分吸收當時考古發現的青銅器，在材料運用上還停留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階段，可視作是商周彝器通考的通俗本。

198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應讀者的要求，決定將殷周青銅器通論重印出版。容庚先生在病前曾親自就初版作了詳細校訂，也作了若干的修訂。如陳夢家指出初版圖版壹陸205所收“車馬狩獵紋方口壺”是偽器，經容先生再三研究，也認為是偽器，便刪除了。有的同道指出圖版玖貳178“祖辛卣”，誤印為“鈎連雷紋卣”，也予以改正。至於有人懷疑圖版陸16“齊侯鼎”的銘文是仿刻，但經容先生考證認為是真刻，故仍保留自己

的見解及說明。可見先生既能知錯即改，又能堅持自己正確的判斷，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1986年8月，劉翔發表容庚手批校訂〈殷周青銅器通論〉遺稿整理一文。劉翔原是廣州市某醫院的掛號員，有志於古文字研究。1974年認識容庚先生後，在容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下自學古文字，於1979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歷史系金文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在深圳大學任教。這本容先生手批校訂的殷周青銅器通論，據劉翔說是容先生送給他學習的。在先生辭世三年之後，他把這份珍貴的遺稿整理出來，公諸於世，以為紀念。劉文按通論的頁碼和行數，分為“原版”、“重印版”和“容庚手批校訂遺稿”三欄。據此文披露，先生對初版本的手批校訂總共有135處。從校訂的文字看，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先生非常重視科學考古發掘的新發現，二是高度評價出土遺物對青銅器銘文研究的重要價值，例如在“科學的發掘”一節中，修訂之處就達八條之多（第8—10頁），其中增加了三十年代對陝西 門鸛臺古代遺址和墓葬的兩次發掘，對河南 汲縣 山彪鎮、輝縣 琉璃閣戰國墓葬的發掘，五十年代對河南 鄭州 白家莊殷代墓葬的發掘等。在“銘文研究的意義和方法”一節（第81頁），當談及“我們要利用銘文考證的成果，再印證典籍上的史料”時，中間插進了“結合考古遺物”一項，把三者作為綜合研究的內容，與饒宗頤先生的“三重證據法”不謀而合。此外還有不少重要的申述，如34頁12行，原版作：“簋之用頓少。”重印版同原版，手批遺稿於“頓少”後增加：“殷代前期的簋是大口，鼓腹，圈足，無耳。殷末周初的簋一般是有兩耳的。西周中期的簋，圈足下還有三足的。晚周有卵形、豆形簋。”又如41頁24行，原版作：“新鄭（圖五四）著錄。”重印版同原版。手批遺稿則作如下補充：“關於此器（按指嬰次盧）的用途問題，王國維認為是飯器；馬吉樟認為是燔盤；關百益因為盧為盤未定，又暫名為方器；郭沫若則認為是古人燃炭之爐。1955年壽縣 蔡侯墓出土有一器，橢圓形，圈足，環耳，自名為鹽，當是盛飯的盧。現該器既自名為盧，故仍王說，歸入盛食器類。”相當詳細而具體地說明考證的過程及分類的理據。在對花紋的描述方面，手批遺稿也更加準確和細密，如112頁倒1行，原版作“夔紋和龍紋一樣具有高度的裝飾性”，重印版同原版，而手批遺稿則在“夔紋”前增加“殷代的夔紋多是一對的，左右對稱，西周中期則多用單獨的，不求對稱。以後更發展成為自身環曲，頭反轉，成S形狀”一段。117頁33行，原版作“構成幾何紋樣”，重印版同原版，而手批遺稿於“紋樣”後增加“更有把屈曲的虺紋細密地糾結起來，構成所謂蟠螭紋”。118頁倒3行，有“鳥紋發展至春秋戰國”句，重印版同

原版，而手批遺稿於句前加入“中期以後，鳥的形狀比較抽象，長尾往往與鳥身分離”。由此可見先生精益求精和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總之，對於學習和使用殷周青銅器通論的人來說，容庚先生這份手批遺稿是不可不讀的。

容庚先生的同鄉摯友、著名哲學家 and 歷史學家張蔭麟教授早就指出，容先生“自幼即醉心於金石之學，壯而彌篤，由文字而及器物，進而及於史迹”。這是對先生治學最精闢和最中肯的高度概括。先生在通考中自言治學經過時說：“余於彝器，初僅治其文字。十四年（1925）冬，為故宮博物院提其彝器陳列，十六年（1927）春，為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始得摩挲，幾及三千器，於形制、文字、花紋三者求之，真偽漸辨。”先生治學先從文字入手，進而涉及青銅器的各個方面，在大量實踐和詳細佔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對文字、形制、花紋做比較系統深入的綜合考察。日本學者水野清在東亞考古學的發達（1953）一文中，把商周彝器通考和梅原末治在1940年出版的古銅器形態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並列為姐妹篇，並大加讚揚，稱為近年來古銅器研究最好的兩本書。著名青銅器學家馬承源先生在中國青銅器中寫道：“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在當時的條件下把青銅器的彝器部分作了盡可能的綜合考察，進行了縝密的論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研究體系。於是，青銅器開始形成了獨立的學科。”唐蘭先生在頌齋吉金圖錄·序中曾經指出：“研究銅器之形制，定其名稱，考其時代，驗其真偽，此古器物學也。研究其所用之字，此古文字學也。研究其銘辭之有關於古史或古代文化者，此古器物銘學也。”上述先生之殷周禮樂器考略屬古器物學也。金文編屬古文字學也。兩周金文辭大系屬古器物銘學也。此三者，構成了中國青銅器學的基本內容。而商周彝器通考則是集古器物學、古文字學和古器物銘學三者之大成者，所以說商周彝器通考是中國青銅器學的奠基之作，是名副其實的。

容庚先生嘗多次指出，當年商周彝器通考在燕京大學出版時，由於紙張不夠，只印四百部，一部分流傳國外。接着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關門，通考從此絕版。可見此書出版時即流通未廣，加以戰亂流失，一般學者無緣寓目。1959年和1962年容庚先生兩次帶助手到全國各地參觀考察，到處都有人向先生打聽哪裏才能買到通考。1980年澳大利亞國立堪培拉大學青銅器專家巴納德教授來訪，在晤談中說到，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他是當作聖經一樣來讀的，並且把此書列作指導研究生的第一部必讀書。可見國內外對先生這部著作之倚重。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曾經在不同場

合談到，目前出版青銅器著作雖多，但還未有可以代替通考者。足見此書重印的價值。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勇於承擔重印名著的重任，決定把這部六十多年前的名著重新製版，嘉惠學林，功不可沒，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二〇〇八年三月

參考文獻

- 容庚：金文編（初版）1925年 天津貽安堂印行；金文編（第四版）1985年 北京，中華書局。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全一冊）1932年 日本文求堂書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函八冊）1958年 北京，科學出版社。
-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全二冊）1941年 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 1958年 北京，科學出版社；殷周青銅器通論（重印版）1984年 北京，文物出版社。
- 容庚、頌齋自訂年譜 載東莞市政協編 容庚 容肇祖學記 2004年8月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容庚：容庚自傳 香港名家翰墨資訊 1994年9月。

主要參考資料

- 馬國權、孫稚雛：容庚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 1985年10月 北京，中華書局。
- 張維持：著名考古學家容庚廣州文史資料第三十八輯 1988年9月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曾憲通編：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容庚文集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4年11月。
-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 1991年10月 臺北南天書局。
-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 2003年1月 書海出版社。
- 曾憲通編注：郭沫若書簡——致容庚 1981年5月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劉翔：容庚手批校訂〈殷周青銅器通論〉遺稿整理 青年學者論學集——深圳大學學報增刊 1986年8月。
- （璋）：容庚、張維持著〈殷周青銅器通論〉考古 1959年第2期。